

# 商代的楚蛮与西周初年的楚国<sup>\*</sup>

尹弘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 湖北 武汉市 430077)

关键词: 三苗; 楚蛮; 楚国; 丹阳

摘要: 传说时代, 江汉地区的古代居民为古三苗, 三苗灭亡后, 其遗裔在商周时代形成了楚蛮部族。商代楚蛮分布在以丹江库区为核心的鄂豫陕交界地区和汉东地区。西周初年, 熊绎受封立国于楚蛮之地, 汉东地区与楚国初封无关, 则西周初年的楚国当在丹江地区, 与丹淅说相合。

**Key Words:** the ethnic group Sanmiao; Chuman Tribes; Chu State; Danyang

**Abstract:** In the legendary epoc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Yangtze-Hanshui valleys were the ethnic group Sanmiao. After their fall, the survivals formed the Chuman Tribes in the Shang-Zhou Period. The Shang Period Chuman tribesmen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joining region of Hubei, Henan and Shaanxi and the eastern Hanshui River Valley, with the area of the present-day Danjiang Reservoir as the center.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Xiong Yi was enfeoffed in the Chuman land and established the Chu State that had no relation to the eastern Hanshui valley in its incipient stage. Thus the Chu State of the Early Western Zhou must have been in the Danjiang River valley,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theory of Danjiang and Xishui valleys.

## 一、前言

商末时, 蚩姓部族的首领鬻熊投奔周文王, 为“文王师”, 与周人建立了政治联系。鬻熊的居地, 《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 武王徙郢”。但鬻熊之时尚无楚国, 周成王时, 鬻熊曾孙熊绎受封为诸侯, 建国于楚蛮之地, 自此始有楚国。熊绎所居, 《史记》卷40《楚世家》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 举文、武勤劳之后嗣, 而封熊绎于楚蛮, 封以子男之田, 姓芈氏, 居丹阳”。虽同名丹阳, 但二者疑非一处。鬻熊所居之丹阳, 当因丹山或丹水而得名, 地当靠近周京; 熊绎的封地则在楚蛮之内。唐孔颖达谓“楚之先君熊绎始封于楚, 在蛮夷之间, 食子男之

地”<sup>[1]</sup>, 刘和惠亦认为《楚世家》中“封熊绎于楚蛮”及“令居楚”二语, 均为楚蛮之地的简称<sup>[2]</sup>。可见楚国之称, 是因其封建于楚蛮之地, 故其国以楚为名。何介钧谓“不是因为封了楚子, 丹阳一带才被称之为楚, 而是因为丹阳一带世为楚蛮所居, 所封子国因袭该地民族(或地域)名称, 取名为楚”, 这是楚国与楚蛮之间的因果关系<sup>[3]</sup>。

可见西周初年的楚国当在楚蛮的范围内。楚国初封之地, 学术界主要有当涂、秭归、枝江、丹淅四说。现当涂说已少有人提及, 秭归说则被考古界所否定, 其余诸说, 都有许多学者所主张。经过长期研究, 这些有关初期楚国及楚都丹阳的说法, 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有文献、考古及地理等

\*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楚国都城与疆域演变研究”(05JJDZH244)系列成果之一, 并得到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科研课题“楚都丹阳探索”(项目编号NK11)资助。

多方面的依据，互相之间相持不下。在此情形下，我们设想通过对楚蛮的考察，来探讨丹阳及周初时楚国之所在，或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当然，文献中对于楚蛮的记载甚为模糊，但我们可以结合考古学观察来判定楚蛮，并与丹阳诸说所主张之地区相印证，就可以确定周初楚国都城及疆域的大致范围。进一步说，周初时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则楚蛮必于商代时已存在，且应有一定的分布范围，通过对江汉地区商文化的分析，就可确定商代楚蛮之所在，并进而探讨西周初年的楚国。

## 二、楚蛮的起源

传说时代，南方地区的居民是苗蛮集团，又称三苗或有苗。三苗的年代，大致与古史传说中尧、舜、禹的年代相当，尧的时代三苗已存在，则其上限或更早于唐尧。

三苗居地大体在长江中游地区，其具体范围，据吴起说是“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sup>[4]</sup>。彭蠡、洞庭即今鄱阳湖和洞庭湖，文山不知其所在，衡山则有争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今湖南省南部的衡山，可能在江北。总的来说，三苗的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西面和南面的界限，文献无征；东面的界限，今江西的大部分地区仍当属于苗蛮；其北界较为明确，大约在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具体而言，东以大别山脉为界邻于东夷集团，西则越南阳一带，侵入外方、伏牛山脉间，北邻于华夏集团<sup>[5]</sup>。这一区域大体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

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华夏集团与南方的三苗集团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史记》卷1《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尧与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sup>[6]</sup>；舜则“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sup>[7]</sup>，舜晚年时还曾亲驾

“南征三苗”，结果“道死苍梧”<sup>[8]</sup>；到了禹时，战争更加激烈，禹利用三苗出现内乱、天灾之机大举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三苗大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sup>[9]</sup>。《说文》：“几，微也，殆也。”三苗从此灭亡，不再见于文献。

三苗灭亡之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称呼消失，可知三苗作为一个族体已经灭亡。但禹不可能彻底灭绝三苗之人，三苗的遗裔当仍在江汉地区生息繁衍。经过夏代的恢复，到了商代，他们发展成一个人数量众多、有强大势力的集团。但这一集团在整个商周时期，显然并没有象以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居民，文化上也较为落后。

这些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在文献中又称荆蛮，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sup>[10]</sup>帝癸即夏桀，表明夏末商初时已有荆蛮。《越绝书·吴内传》则谓“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这两条文献虽然年代较晚，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后代人的记忆中，荆蛮于夏商之际时已经存在，至于荆服于商，是行征伐还是行仁义的结果，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商代后期亦有荆蛮的记载。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挾彼殷武，奋伐荆楚。罍入其阻，袞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殷武即殷王武丁。这两条文献互证，可知商代后期亦有荆蛮，此时荆蛮已相当强大，居于南方、占地广泛。周初时，则有周成王封熊

绎于楚蛮。

荆蛮的地域，大抵为原三苗之居，其年代则在三苗灭亡之后四五百年，后来荆、楚通用，因此荆蛮即楚蛮。对楚蛮（荆蛮）的族源，学者有较一致的看法，均认为楚蛮为古三苗之后：张正明认为楚蛮的主体应是传说时代“三苗”的遗裔<sup>[11]</sup>；伍新福认为商周时期的荆蛮是原三苗的后裔，“他们经过数百年的较为和平的发展后，势力又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着‘三苗’、‘有苗’，而以地命名，称之为‘荆蛮’、‘蛮荆’或‘荆楚’，其实，他们就是三苗的后裔”<sup>[12]</sup>；刘玉堂亦认为禹征三苗之后，“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或‘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sup>[13]</sup>。按学者认定楚蛮或荆蛮为古三苗之后，除了居地相同、时代相接外，也因苗与蛮实为一义，苗可音转为蛮，蛮亦可音转为苗，苗、蛮二字属阴阳对转。徐旭生先生认为，感觉不到苗、蛮之间有什么分别<sup>[14]</sup>；民族学界则认为，三苗、荆蛮、苗族为同一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呼<sup>[15]</sup>。

由上可知，楚蛮为古三苗的遗裔，文献中又称为荆蛮，是商周时期由三苗遗民发展而来的一个部族。其族源属南方的苗蛮集团，与中原的华夏集团无关，但由于禹征三苗和商汤征荆，楚蛮在文化上可能已与中原较为一致。

### 三、商代楚蛮的考古学观察

古史传说中三苗的兴盛与灭亡，以及楚蛮作为三苗遗裔的兴起，正与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演进基本同步。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曾鼎盛一时。丹江流域一带本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也就是中原华夏集团的势力范围，但后来成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屈家岭文化强盛时，“不断向北扩展，原为下王岗文化的鄂西北、豫西南地区已成为屈

家岭文化的活动领域”，其文化影响则深入到了豫中和陕南地区<sup>[16]</sup>。这是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中原华夏集团与南方三苗集团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考古学文化背景。

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形势逆转，中原龙山文化日益强盛，对邻近的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石家河文化中出现了大量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考古学者认为，石家河文化中的蓝纹、方格纹及袋足鬻的流行与龙山时代的来临有关<sup>[17]</sup>，“黄河流域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石家河文化”<sup>[18]</sup>。石家河文化晚期，中原因素的大量进入使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性质发生了质变，其陶器群体已失去石家河文化的共性特征，长江中游地区的本地特征越来越少，除少量因素外，主体部分与石家河文化并无关系，“倒几乎涵盖了中原地区煤山类型几乎全套的器物组合”<sup>[19]</sup>，因此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这应是不同于石家河文化性质的另一支考古学文化。对于此类遗存，学者有不同的称呼：孟华平称为“后石家河文化”<sup>[20]</sup>，杨权喜则称之为石板巷子文化<sup>[21]</sup>，王劲则称为“三房湾文化”<sup>[22]</sup>。

后石家河文化只有部分因素源自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有质的不同，大部分因素来自中原同期的龙山文化，尤其是煤山类型。因其与煤山类型的密切关系，被考古学者“视作煤山文化江汉地区的一种变体”，其成因是中原华夏文化的南下<sup>[23]</sup>。“来自中原的后石家河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结构。”<sup>[24]</sup>后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王劲综合碳十四数据，考定早期约距今4200年，晚期距今3900年左右，与煤山类型基本相当<sup>[24]</sup>。煤山一期已进入夏代<sup>[26]</sup>，表明后石家河文化已属于夏代初年。

由上可知，古三苗的分布范围、活动年代，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

化、石家河文化基本相当，其兴衰亦基本同步，故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即三苗所创造的文化遗存<sup>[27]</sup>。而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进过程及其年代，正与文献记载中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及三苗的灭亡相吻合。

后石家河文化则是中原文化南下江汉地区后，融合本地部分因素的结果，是煤山类型进入江汉地区后，在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结合文献记载，这当是禹征服三苗后迫使三苗居民改宗中原文化。按三苗与华夏集团的战争，主要是由于三苗的兴盛导致利益上的冲突，但文化、宗教上的冲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尚书》卷19《吕刑》有“苗民弗用灵”的说法，徐旭生先生认为当时苗蛮集团信奉的是原始的巫教，而中原地区自帝颛顼进行宗教改革以后就采信了较进步、宗教性较浓厚的巫教，于是北方集团以他们的眼光看苗民自然就很不顺眼；另外苗蛮集团中的刑罚特别严酷，于是北方集团便以上天的名义前去征伐。《吕刑》在痛斥苗民刑罚残酷后说“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其意为：上帝哀怜众得罪人的真正无罪，拿严威答复行虐政的苗民，要阻止苗民，使他们在下土不得有后嗣。这种文化、宗教上的冲突也是苗蛮集团与华夏集团发生战争的原因之一，虽然并非冲突的主要原因，但却可以增加冲突的程度<sup>[28]</sup>。由于华夏集团与三苗的战争有这种文化、宗教的背景，从舜的时代起，华夏集团就试图对三苗进行文化改造，让苗民接受中原文化。《吕氏春秋》卷20《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鬻有扈，以行其教。”可见华夏集团在对外扩张时，让被征服部族接受中原文化是其一贯政策，更何况华夏与三苗的冲突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宗教背景。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发生的重大变化，应当就是华

夏集团对苗民“易其俗”、“行其教”的结果。

后石家河文化在江汉地区分布甚广，王劲将其分为四个类型：三峡地区为“白庙类型”，鄂西地区为“石板巷子类型”，鄂豫陕交界处的丹江库区为“乱石滩类型”，江汉平原则为“三房湾类型”<sup>[29]</sup>。但后石家河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江汉地区并没有得到持续发展，而是基本上消失了。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后石家河文化之后出现了中断。

西陵峡区的白庙类型没有发展下去，而是为朝天嘴一路家河类型所取代。这一支考古学文化是来自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年代约在夏至西周初年<sup>[30]</sup>。在鄂西地区和汉水中下游平原地带，石板巷子类型和三房湾类型基本上消失了，整个地区仅有江陵荆南寺<sup>[31]</sup>、钟祥乱葬岗<sup>[32]</sup>和襄阳王树岗<sup>[33]</sup>三处遗址有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约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而且荆南寺和乱葬岗的二里头文化遗存都比较单薄，遗物很少，说明夏代之时，这两处遗址都是人口稀少的居民点。在北部和东部边缘区，情形则稍有不同，石家河文化的遗民似乎在夏代有一定的持续性发展。在鄂豫陕交界处的丹江库区，淅川下王岗遗址有二里头文化一、三期的遗存<sup>[34]</sup>，早年即有学者将此类遗存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sup>[35]</sup>。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近年发掘的郟县辽瓦店子遗址，发现有丰富的夏商时期文化遗迹与遗物。辽瓦店子遗址夏商时期遗存分为三期六段，第一期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第二期年代相当于夏末或夏商之际<sup>[36]</sup>。汉东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除石河遗址群外，还见于随枣走廊的西花园遗址<sup>[37]</sup>。汉东地区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在黄陂盘龙城、大悟土城、墩子畈、孝感聂家寨等处有少量的分布<sup>[38]</sup>，其中盘龙城遗址一至三期属二里头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

二至四期或偏晚<sup>[39]</sup>。由上分析可见,进入夏代,在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内,仅有汉东地区和丹江地区的古代居民保持了其延续的发展,其他地区或是一片荒芜,或是被外来文化所取代。

到了商代,江汉地区的人类社会有了较大程度的恢复,不再是夏代那种蛮荒的景象。而商代的楚蛮,可能就分布在这些商代的考古学文化之中,通过对这些商代遗存的文化面貌及族属来源的分析,或可将商代的楚蛮确定下来。

要从考古学上判定商代的楚蛮,首先要讨论商代的楚蛮具有哪些特征。

从上引《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及《帝王世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来看,南蛮可能是中原人对南方居民的通用称呼,因此整个南方地区(至少是长江中游)的古代居民似皆可称南蛮,而楚蛮(荆蛮)则是南蛮中与中原联系较多、关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从楚蛮与中原王朝有较紧密的联系及商周王朝曾征伐楚蛮来看,楚蛮在地理上亦应与中原较为邻近。从族源来看,楚蛮应为古三苗的后裔,三苗灭亡后接受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在文化上,华夏集团战胜三苗后,对苗民“易其俗”、“行其教”,于是三苗余众接受了中原文化,因此楚蛮似应为接受了中原文化的三苗余众,后石家河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出现,有可能就是三苗余众改宗中原文化后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表现形式。综合以上分析,这一部分在地理上邻近中原、政治上接受了中原王朝的统治、文化上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南方苗蛮民众,可能就是商周时期屡见于文献的楚蛮(或荆蛮)。结合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演进来分析,经过后石家河文化的改造以后,楚蛮在文化上可能与中原有较高的一致性,同时又有江汉地区本地因素的传承。在地域上,楚蛮既为古三苗的后裔,则其居地应在

原石家河文化的范围之内;但商周王朝曾多次征伐楚蛮,则楚蛮所在应为江汉地区中较邻近中原的部分,属于原石家河文化的边缘区。在时间上,向上追溯,应有从石家河到后石家河和夏、商的连续性;向下延伸,考虑到楚蛮与楚国纠缠不清的关系,楚蛮在文化上与目前认定的西周时期的早期楚文化应有某些联系。

依据上述标准,我们对江汉地区的商文化逐个进行分析,或可从考古学上对商代的楚蛮作一些大致的推定。

在鄂西沿江及峡区内,夏商时期是朝天嘴一路家河文化的持续发展。这一支考古学文化倒是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但朝天嘴一路家河文化与中原相距过远,与中原夏商文化缺乏联系,文化因素中来自中原的影响极为微弱,倒是与四川盆地文化系统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考古学界已普遍认定,这一支考古学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向东扩张的结果,似可判断朝天嘴一路家河文化与楚蛮无关。

在江汉平原南部的荆沙地区,分布着荆南寺类型商文化和周梁玉桥文化。荆南寺类型所在地区虽与中原相距较远,但荆南寺类型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有较紧密的联系,是中原商文化与朝天嘴一路家河文化及本地新石器传统融合的产物,另有少量澧水流域青铜文化和长江下游青铜文化因素<sup>[40]</sup>,荆南寺遗址还具有从新石器到夏商的连续地层。就此而论,荆南寺类型为楚蛮的可能性颇大。但荆南寺类型并未得到延续发展,其下限仅至殷墟一期,以后即为周梁玉桥文化所取代<sup>[41]</sup>,并未发展至周代或商末周初之时,缺乏向下的延续性,其文化没有得到连续的发展。以此而论,荆南寺类型不可能是楚蛮。此外,荆南寺类型仅此一个遗址,迄今为止并未发现大面积的分布。周梁玉桥文化则是一支受澧水流域青铜文化影响的地域文化,时代比荆南寺略晚,相当于中原殷墟阶

段,其文化构成有两种主要的因素:第一种以釜、釜形鼎、高领广肩罐为代表,鼎、釜形态相似,区别仅在于有无三足,此类因素在周梁玉桥文化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釜和釜形鼎占出土炊器的80%以上;第二种以鬲、簋为代表,受中原商文化影响。总的来说,中原文化因素在周梁玉桥文化中的影响很小,其文化面貌与相距仅10千米的江陵荆南寺截然不同,与后来的早期楚文化也完全不类,难以建立联系,但与澧水流域的青铜文化有一定联系。在时间上,周梁玉桥文化在殷墟一期时与荆南寺类型共存,殷墟二期以后取代了荆南寺类型占有荆沙地区,西周早期时衰微,以后即在荆沙地区消失了<sup>[42]</sup>。有学者认为周梁玉桥文化源于澧水流域的青铜文化<sup>[43]</sup>。周梁玉桥文化是以釜和釜形鼎为代表的文化体系,楚文化则是以鬲为代表的文化体系,故高崇文认为“二者泾渭分明,没有任何内在联系”<sup>[44]</sup>,杨宝成亦认为“以鬲为陶器组合核心的鄂西西周晚期文化与以鼎釜为核心的西周早中期文化,当为两个不同族属的文化共同体,两者虽在时代序列上相互衔接,但并不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sup>[45]</sup>。由此看来,周梁玉桥文化亦非楚蛮。

在汉东地区,是盘龙城类型商文化的分布区域。盘龙城是江汉地区最重要的商代遗址,是一处以宫城建筑为中心、周围分布着众多居民遗址、手工作坊和各类墓葬的遗址群。盘龙城遗址经历过多次发掘,研究工作的做得较为细致。盘龙城遗址的时代从二里头文化晚期一直到殷墟文化初期,即从夏代晚期到商代早中之际。在鄂东北地区,除盘龙城遗址外,共有40余处商代遗址、5处商代墓地<sup>[46]</sup>。在文化面貌上,盘龙城文化与中原商文化有很高的一致性。《盘龙城》报告将其陶器遗存分为四组,甲组为中原商文化因素,乙组为本地特征,丙组为长江下游的湖熟文化因素,丁组则为江西吴城文化

因素。四组因素中以甲组为主,乙组为次,有少量的丁组,丙组仅具微量<sup>[47]</sup>,因此考古学界普遍认为盘龙城文化是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至于盘龙城的性质,有方国说和商朝在南方的据点两说,目前一般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在南方的一处军事据点。同时,作为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土著文化因素及周边因素的影响,如陶系中红陶比例较大,红陶大口缸较多见等。高崇文认为,盘龙城文化中的红陶器虽与商文化中的同类器相似,但在陶质、陶色及局部器形上又有一定的差异性,与典型商文化中的灰陶器不同,是当地土著在中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因素,“这批器物本身就体现了两种文化因素”<sup>[48]</sup>;至于红陶大口缸,在江汉平原使用了很长时间,张万高、笪浩波均认为是来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江汉地区传统因素<sup>[49]</sup>。在与楚文化的关系方面,盘龙城王家嘴遗址下层,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中出土的连裆鬲,是目前楚式鬲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源头<sup>[50]</sup>。高崇文早年亦认为,西周时期鄂西地区的早期楚文化,与本地夏商时期的土著文化无缘,反而与汉东地区的夏商文化有着内在的亲缘关系<sup>[51]</sup>。现在高崇文对此观点有所修正,认为江汉平原的商文化遗存与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还不是直承发展的文化系统<sup>[52]</sup>。高崇文的这一修正当然是正确的。早期楚文化不是从湖北汉东地区的夏商文化中直接发展起来,不是一个直承发展的文化系统,中间还隔着周文化,但早期楚文化可在汉东夏商文化中找到渊源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盘龙城商文化中的红陶器,有别于以灰陶为主的典型商文化因素。从近期对早期楚文化的研究来看,红陶正是早期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sup>[53]</sup>,楚式鬲也可在盘龙城夏商文化中找到最早的渊源。在地域上,汉东地区与中原相邻。总之,以目前的资料及认识而论,盘龙城类型商文化有可能包含了部

分与中原联系较紧密的江汉土著蛮族，商代的楚蛮（或荆蛮）可能是使用这支考古学文化的人群之一。

鄂豫陕交界地区的商文化以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近年发掘的辽瓦店子遗址为代表。该遗址的资料尚未发表，但已有部分披露。据王然、傅玥研究，辽瓦店子遗址夏商遗存第三期典型的商文化遗存，分三段，第一段为二里岗上层，第二段为中商二期至殷墟一期，第三段为商末或商周之际。辽瓦第三期遗存第一、二段，中原商文化因素占绝对优势地位，第三段时典型商文化退出该地区，本地文化则在商文化的影响下继续发展，并开始受到西周文化影响<sup>[54]</sup>。鄂豫陕交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连续发展的，从石家河、后石家河到二里头、商、西周，此地区一直保持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没有出现江陵地区从荆南寺类型到周梁玉桥文化的变迁。从该地区早年发掘的均县朱家台<sup>[55]</sup>、襄樊真武山<sup>[56]</sup>及最近披露的陕西商南县过凤楼<sup>[57]</sup>等遗址的情况来看，鄂豫陕交界地区的西周文化能与鄂西地区的早期楚文化建立直接的联系<sup>[58]</sup>。刚刚发表的辽瓦店子东周遗存，年代上限可至两周之际，下限可至战国中晚期，与楚文化有密切联系，简报认为至少从春秋早期开始就主要属于楚文化范畴<sup>[59]</sup>。在地域上，鄂豫陕交界地区是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南蛮之地”，且邻近中原。由此看来，楚蛮有可能是商代时鄂豫陕交界地区的古代居民之一。

分析可见，在江汉地区的商代文化中，汉东地区和丹江地区在地理上较为邻近中原，在文化上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是中原文化的地方变体，主体文化面貌与中原商文化一致，同时又有一类受中原商文化影响、但又有别于中原商文化的新因素。则商代的楚蛮可能就在这一类考古学文化中，是使用此类考古学文化的古代居民之一。

#### 四、商代楚蛮地望

商代的楚蛮，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有洛为古族名，《逸周书·史记解》：“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谨无食，成汤伐之，有洛以亡。”张华《博物志》卷十亦谓“昔有洛氏……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氏以亡。”有洛氏之族，当在洛水流域，《尚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孔传“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可知有洛当在洛水流域。而商师征有洛之后再征荆，则此荆必近洛水，又荆蛮（楚蛮）为古三苗的后裔，则荆蛮之地，应在古三苗的分布范围之内，至少不会相去太远。据前引徐旭生先生的考证，苗蛮集团的北界，在今河南西部南阳以北、熊耳、伏牛、外方诸山脉间，正与洛水流域相邻。从自然地理来看，熊耳、伏牛、外方山脉以北，为伊水、洛水流域，以南即丹淅水、唐白河流域，而丹淅水、唐白河流域正好在苗蛮集团的分布区内。由此可见，商师所征之荆蛮，当在伏牛、熊耳、外方山脉以南的丹江流域。此处还可补充一条旁证，据石泉先生考证，内乡（按内乡在淅水以东不远处）附近，有最古的荆山<sup>[60]</sup>。由此可知，今鄂豫陕交界处的丹淅流域，应为当时楚蛮（荆蛮）的分布地区之一。

又据《商颂·殷武》和今本《竹书纪年》，武丁曾伐荆楚，甲骨文中亦有武丁南征的记载：

乙未 [卜]，贞：立事 [于] 南，右比 [我]，中比與（举），左比曾。

乙未卜，贞：立事 [于南]，右比

我，[中]比與（举），左比[曾]。十二月。<sup>[61]</sup>

这两条甲骨文均属武丁时期。“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说商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我、曾、举均为商代方国。据李学勤先生考证，曾在今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的新野这一范围内，举在汉东举水流域<sup>[62]</sup>，我的地望不可考，当与曾、举相邻。“比”则有联合、配合之义<sup>[63]</sup>。罗运环认为，这两条卜辞是说，商王武丁亲帅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配合下征伐荆楚<sup>[64]</sup>。举、曾两国均在汉东地区，则武丁所征之荆楚当去举、曾之地不远。武丁伐荆楚，或与商代楚蛮的兴起及盘龙城的废弃有关。盘龙城城址始建于二里岗上下层之间，废弃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则其始建年代相当于商王中丁在位或稍早的公元前1450年左右，废弃于盘庚迁殷前的公元前1300年之前<sup>[65]</sup>。盘龙城的性质，现一般认为是商人在南方的重要军事据点。据《史记》卷3《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商朝在“九世之乱”期间，国力衰微，而地方势力则乘机兴起，商的势力处于退缩之中，可能商朝在此期间失去对荆蛮的控制，而盘龙城之废弃，或与此背景有关联。至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国力复振，极力对外反击，尤其是武丁在位期间，大征四方，武丁征荆蛮一事或在此背景下发生。由此推测，汉东地区在商代亦应为楚蛮分布地区。

以上从文献分析中得出的商代楚蛮地望，正与考古学观察的结果相合。

## 五、结 语

确定了丹江地区和汉东地区为商代楚蛮之地，就可从楚蛮与楚国的关系来推定西周初年的楚国及楚都丹阳之所在：熊绎受

封于楚蛮之地，而商代的楚蛮分布在丹江地区和汉东地区，汉东地区与楚国初封无关，则周初之楚国及楚都丹阳必在丹江地区。此一结论正与楚都丹阳“丹淅说”相合。丹淅说所主张的丹江下游丹淅之会地区，正在商代楚蛮范围之内，熊绎始封之地当在此地。

- [1] 左传·桓公六年“天方授楚”句下。正义。
- [2] 刘和惠·楚丹阳考辨·江汉论坛，1985，(1)。
- [3] 何介钧·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楚文化研究论集(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12。
- [4] 战国策·魏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5]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5~67、75~76。
- [6] 吕氏春秋·召类·卷二十：“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 [7] 尚书·舜典·卷三。
- [8] 淮南子·修务训·卷十九。
- [9] 墨子·非攻下·卷五。
- [10] 按今本《竹书纪年》，自王国维以来，学界皆以为伪书，然今人陈力、美籍学者夏含夷等皆认为今本《纪年》不伪。说见：
  - a. 陈力·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85，(28)。
  - b. 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1] 张正明·楚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52。
- [12] 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关系新探·求索，1988，(4)。
- [13] 刘玉堂·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江汉考古，2001，(1)。
- [14] 同[5]：65。
- [15] 石宗仁·苗族与楚国关系新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6)。
- [16] 向绪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305。
- [17]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6)。
- [18]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65。
- [19] 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67。
- [20] 同[20]。
- [21] 杨权喜·关于鄂西六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探

- 讨. 考古, 2001, (5) .
- [22] 王劲. 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 江汉考古, 2007, (1) .
- [23] 白云.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 江汉考古, 1993, (4) .
- [24] 同 [20] .
- [25] 同 [22] .
- [26] 杨育彬. 从考古发现探索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 华夏文明 (一).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27] a. 俞伟超. 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 文物, 1980, (10) .  
b. 李龙章. 江汉新石器文化族属考. 江汉考古, 1988, (2) .  
c. 张绪球. 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概论.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318~323.
- [28] 同 [5]: 121~124.
- [29] 同 [22] .
- [30] a. 林春. 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 江汉考古, 1984, (2) .  
b. 杨权喜. 三峡的重大考古发现. 江汉考古, 1994, (1) .
- [31] 荆州地区博物馆, 北京大学考古系. 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 考古, 1989, (8) .
- [32] 荆州市博物馆等. 钟祥乱葬岗夏文化遗存清理简报. 江汉考古, 2001, (3) .
- [33] 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 湖北襄阳法龙王树岗遗址二里头文化灰坑清理简报. 江汉考古, 2004, (2) .
- [3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浙川下王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35] 李龙章. 下王岗晚二期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探讨. 考古, 1988, (7) .
- [36] 王然, 傅玥. 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研究. 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190~191.
- [37] 同 [20] .
- [38] 熊卜发. 浅谈鄂东北地区古代文化. 鄂东北地区文物考古.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3.
- [3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九六三——九四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
- [40] 王宏. 荆南寺商代陶器试析. 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一). 武汉: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7.
- [41] a. 同 [31] .  
b. 王宏. 论鄂西南、湘西北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 文物考古文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42] a. 王宏. 论周梁玉桥文化. 江汉考古, 1996, (3).  
b. 王润涛. 鄂西古代文化浅识. 文物考古文集.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43] 同 [42] b.
- [44] 高崇文. 从夏商时期江汉两大文化因素的源流谈楚文化起源. 楚文化研究论集 (三).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 [45] 杨宝成. 试论西周时期汉东地区的柱足鬲. 楚文化研究论集 (四).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466.
- [46] 熊卜发. 鄂东北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序列概述. 鄂东北考古报告集.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 [47] 同 [39] .
- [48] 同 [44] .
- [49] a. 笪浩波. 湖北商时期古文化分区探索. 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二). 武汉: 江汉考古增刊, 1991.  
b. 张万高. 江陵荆南寺夏商遗存文化因素简析. 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 (二). 武汉: 江汉考古增刊, 1991.
- [50] a. 王光镐. 楚文化源流新证.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151、152.  
b. 杨权喜. 江汉地区楚式鬲的初步分析. 楚文化研究论集 (一). 武汉: 荆楚书社, 1981.
- [51] 同 [48] .
- [51] 高崇文. 楚文化渊源新思考. 楚文化研究论集 (六).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492.
- [53] 张天恩. 丹江上游西周遗存与早期楚文化关系试析. 周秦文化论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54] a. 同 [36]: 194~195.  
b. 傅玥. 汉水上游地区夏商时期遗存出土陶器研究. 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工作队. 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 考古学报, 1989, (1) .
- [5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襄樊市博物馆. 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 考古学集刊 (九), 1995.
- [57] 杨亚长, 王昌富. 陕西地区楚文化遗存初探. 考古与文物增刊, 先秦考古专号, 2002.
- [58] a. 谭远辉. 试论朱家台西周遗存与楚文化的关系. 楚文化研究论集 (三).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b. 张昌平. 试论真武山一类遗存. 江汉考古, 1997, (1) .  
c. 同 [53] .
- [59] 武汉大学考古与博物馆系, 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 湖北郧县辽瓦店子东周遗存的发掘. 考古, 2008, (4) . (下转 95 页)

局, 1986: 52 ~ 53.

[7] 裘锡圭. 说“仆庸”.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366 ~ 386.

[8] 郭沫若. 弭叔簋及询簋考释. 文物, 1960, (2): 5 ~ 8.

[9] 夏含夷. 父不父, 子不子: 试论西周中期询簋和师酉簋的年代. 古史异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01 ~ 204.

[10] 王祥. 说虎臣与庸. 考古, 1960, (5): 33 ~ 36.

[11]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44.

[12]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624.

[13] 同 [7].

[14] 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246.

[15] 沈长云. 琯生簋“土田仆庸”新释. 古文字研究 (22).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73 ~ 78.

[16] 弓建中等. 秦夷·秦人·秦胡.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七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0.

[17] 王国维. 观堂集林, 卷十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8] 李学勤. 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 人文杂志, 1981, (6).

[19] 史记·秦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0] 彭裕商先生将五祀卫鼎、永孟和南季鼎定为夷王时器。(参见彭裕商.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 356 ~ 373.) 但遣仲见于班簋, 班簋被学界公认为穆王前期器, 井伯多见于西周中期诸器, 如鬲簋铭文中出现井伯, 综其器形、纹饰、铭文书体及铭文内容来考察, 其绝对年代不出穆恭时期。走簋铭文中亦出现井伯, 学者多将其为恭王时器, 卫簋纪年为二十七年, 不论文献抑或金文从未见到夷王纪年有超过十六年的明确记载。

\*\*\*\*\*  
(上接 73 页)

[60] 石泉. 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浙附近补证.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208.

[61] 郭沫若主编, 胡厚宣总编. 甲骨文合集, 第 3 册第 5504、5512 片.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62] 江鸿. 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 文物, 1976, (2).

[63] 凌云. 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 古文字研究

因而, 笔者认为学者们将五祀卫鼎、永孟和南季鼎定在恭王前后还是可信的。

[21] 王世民, 张长寿, 陈公柔.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88.

断代工程曾将此器定在厉王时期, 但考虑到师俗已见于五年卫鼎铭文, 此时, 伯俗父既然能和井伯等王朝重臣分庭抗礼, 表明其地位已然不低, 其年岁也不会太轻, 师晨鼎的纪年为三年, 即便按照断代工程所拟西周王年表, 恭王五年至厉王三年也已历四十余年。另外, 据《帝王世纪》、《皇极经世》、《通考》、《通鉴前编》等文献记载, 夷王的在位年数应该有十六年。如此, 恭王五年距厉王三年则有近五十年的时间, 不大符合古人的正常生理年龄, 因而, 笔者倾向于王世民等先生的看法。

[22]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88.

[23] 同 [9].

[24] 同 [11].

[25] 同 [9].

[26] 朱凤瀚. 师酉鼎与师酉簋. 中国历史文物, 2004, (1): 4 ~ 10.

[27] 彭裕商先生由师酉簋记载师酉的执掌比询簋所记询的执掌范围要小, 以及询簋的铭文措辞表明询所司为周王初命两方面, 认为师酉和师询可能并不存在亲属关系。(参见彭裕商.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成都: 巴蜀书社: 2003: 483 ~ 485.)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有问题的。同一职官的执掌不同时期会有一些变化是正常现象,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询簋铭文既已提到“丕显文武受命, 则乃祖奠周邦”, 这表明询的先祖已为王官, 如果我们承认西周实行世官制, 周王对询的册命当已非初命。

(责任编辑: 李素婷)

\*\*\*\*\*  
(6).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64] 罗运环. 楚国八百年.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68.

[65] 徐少华. 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 江汉考古, 2003, (1).

(责任编辑: 李素婷)